



社會變革中教育研究者的使命：
大學評鑑中台灣女性公共知識份子的挑戰¹

周祝瑛

台灣政治大學教育系

Email: iaezcpc@nccu.edu.tw

摘要

本文試圖從近年來台灣重視世界一流大學排行榜，與大學學術評鑑制度中過度倚賴國際期刊量化指標的趨勢，導致文、理評鑑標準未能釐清的情況下，探討台灣的大學教授，尤其是女性教師，如何突破這些難關與挑戰，履行葛蘭西與薩伊德等所稱頌的公共知識份子角色之社會責任。

壹、 世界大學排行榜風潮

近年來，全球刮起了世界大學排行榜的風潮，這股潮流首先來自中國的上海交通大學，為了解中國大學與世界知名大學間科研成果的差異，於 2003 年透過一些評量指標，建立「世界大學學術排行」資料庫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簡稱 ARWU)，而後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成為評比世界大學排名的重要排行榜。其評量指標包括：畢業校友是否獲得諾貝爾獎，以及在該領域中的獲獎數；在校教授獲得諾貝爾獎及各領域獎章；在各學科領域被引用的次數；科學及自然 (Science and Nature) 中發表的文章比例；在 SSCI、SCI、AHCI 發表的文章數；以及師均學術表現；對於人文社會研究之大學，並不計算 N&S (Nature & Science 論文折合數) 指標，而是將其權重平均分配至其他指標

¹ 本文改寫自「雙重障礙：從公共知識份子和女性大學教師的角色談起」，初稿發表於「教師專業成長問題研究：理念、問題與革新」乙書。台北：學富文化。2004. 12。

(Liu & Cheng, 2010)。不過，交通大學的排行榜因太強調諾貝爾獎的得主，過於科學取向，對於社會科學領域不夠重視，因而備受批評。

英國泰晤士報的高等教育（附刊）（The Times of High Education Supplements，簡稱 THES）繼而產生。其評量指標包括：研究品質、畢業生就業率、國際形象、師生比等項目。從 2004 年該報告增加「諾貝爾獎」的得獎數量，尤其學術的評量標準。為人所詬病的是，該排名由一千多位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同儕評比，容易受到人為因素，影響公平性問題。

此外，全球也有不少機構在進行大學的排行與評比，如：Webometrics 網路排行，在 2004 年開始透過網路調查，針對全球一千所大學，及五千個研究中心的學校網路系統，計算連接的次數，排出全球前三千名大學。但缺點是有些學校網路發展較慢或不重視，即使有很高的學術水平，也不見得能在網路評比中名列前茅。亞洲周刊 (Asiaweek) 也於 1997 年公布第一份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 (Asia Week Limited, 2000, June 30)。屬於歐盟的歐洲委員會 (UOPM Commission Ranking) 排行榜，針對歐洲 22 所大學，就「影響因素」及「科學」這兩部份評比，並進行歐美比較，如：科學與技術的排行，資料可自由下載，也可根據不同指標進行搜尋。其評鑑標準首先強調歐洲每一個國家的一流學校，包括出版數及引用率、學校影響力，及科學領域研究的權威性等，包含綜合大學、科技學院與技術大學都進行排行。

而加拿大的 Macleans，針對加拿大大學做排行榜；愛爾蘭也出版 Sunday Times，針對師生研究的效能及高中畢業學生進入這些學校的比例程度、住宿條件等學校設備，進行評比。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系列學校排名的始作俑者應數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從 1984 年為提供高中生家長與學生在選擇學校時參考，開始進行美國研究型大學排行，評比標準包括：研究方式、同儕的評量及校長、副校長等意見、六年畢業率的學生比例；標準測驗成績；班級人數、教師薪水、教師學歷、師生比率等資源；每生平均投資成本、畢業後表現，以及校友捐贈力等，是美國大學廣泛使用的排行指標（周祝瑛，2009）。

在全球化的歷程中，這一波世界大學排行報告已對各國的高教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亞洲地區都刮起了世界一流排行榜的旋風。各國政府多少都出現擔心該國大學未能夠進入世界百大排行的「集體焦慮」，包括：中國、日本、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甚至越南等地政府，皆紛紛投入經費，希望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大學。例如：台灣 2005 起推出五年五百億的高教育經費，透過特殊預算，希望在五年中打造幾所世界一流的大學。而越南即透過亞洲銀行的基金營造大學，希望提供至少四千名學生一流設備。

儘管如此的大學排行風氣，造成學術界重視研究為主、弱化教學的情況，然而美國高教研究學者 Altbach (2007) 卻肯定這樣的發展趨勢，他認為：無論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需要打造至少一所國家級的「研究型大學」(避免「世界一流」的名稱)，由政府提供長期穩定的經費、尊重學術自由、強調科學研究出版、招募國際一流教授，致力建立世界一級的研究中心，提供該國一流人才就學機會。在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卻要避免大學朝向商業化的趨勢，不以營運為導向。所有教師的工作表現也應建立評比的標準，經費分配可以透過競爭機制爭取，並聘用較多的全職教師，減輕大學中的教學負擔，以刺激更多研究產出。他認為各國為防止人才外流，應與國際學術社群保持暢通無阻的連繫，但各大學都要發展本國特色，使用當地的語言、學術期刊，為本國培養下一代，讓各國都有一流的科學家、社會學家等一流的人才。因此，各國應致力於至少一所研究型大學的建構。

貳、 台灣實施高教評鑑的影響

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台灣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出現各種發展質量失衡、教育資源排擠、階級複製等問題後遺症，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部門遂透過大學法等法規修訂工作，試圖從事大學財務的健全化、國際化及評鑑標準化等制度的建立，以期解決高教擴張等問題。如 2005 年以來，教育部開始以提高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與能見度之理由，接連提出「追求卓越計畫」、「頂尖大學」及建立大學評鑑政策等，直接促成各高等教育以量化指標作為評鑑標準的發展方向。此外，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的各項研究補助也以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 & HCI)等期刊資料庫之論文數與被引用次數 (impact factor)，作為學術研究的評量標準，及各種計畫獎補助之依據。這些評量標準造成了台灣學界日後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為主要的研究取向，中文發表形式漸不受重視；研究議題也儘量符合國際期刊之要求，而非本土所關懷之議題；其中研究出版形式出現「重期刊論文，而輕專書」、「發表篇數勝於一切」等情況。因上述期刊以英語居多，於是許多研究論文以英語形式發表 (Chen & Qian, 2004；周祝瑛，2009)。尤其接受政府追求卓越高教政策獎助的大學，成立各種如「頂尖大學辦公室」等機構，致力於發展重點領域與頂尖學術研究，加強國際化程度，支持學術研究與行政革新，建構各個學科基礎建設等。然而，在上述各項以追求大學卓越發展為目標的背後，卻仍免不了充滿以量化評鑑指標，作為評鑑教師學術表現依據的迷思，不僅忽略了文、理領域不同之特性、各學門間的差異，也同時加劇了校際間、各學院甚至各科系間不甚公平的競爭。黃慕萱 (2007) 指出，不管是何種評鑑，目的都是在提升品質，必須考量到學科性質以及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不應只用單獨一套標準，來凸顯受評者之優缺點。

然而台灣目前的大學學術評鑑與各種獎勵措施上 (包括教授間的彈性薪資)，經常出現文理不分的情況，採計每位教師在 SCI、SSCI、A&HCI 等國際期刊資料庫篇發表的篇數、智慧財產權、與技術轉移證明等，來評定大學好壞。政府部門也為了加速大學與全球學術社群同步，紛紛透過各項研究計畫補助等政策，全面推動這一波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為主要的研究取向，結果出現了以下現象 (Chen & Qian, 2004)：

1. 鼓勵以英語發表論文，其他語系包括以中文發表的期刊論文或專書不再具優勢。
2. 為了增加投稿的錄取率，國際議題成為研究主流，國內議題相對不被重視。
3. 投稿對象以國外的英語期刊為主，政府與大學獎勵著重刊載篇數的多寡而非文章的品質。
4. 形成以量化為指標的評鑑機制，拉大文理在出版量與資源分配上的差距。

上述發展引發許多人質疑所謂的全球學術標準，若以在國際期刊資料庫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作為評鑑標準，是否能真正提升一國整體學術品質？另外，由於文理之間研究典範與發表形式等方面存在著差異，理工科的學術社群大多支持這項新的評鑑指標，相對的人文社會為主領域則備受打擊，許多非理工類型的大學對此感到隱憂，尤其在 2003 年 10 月，台灣各大媒體競相報導教育部所公布的國際學術論文排名中，以政大為首的人文社會型等大學都遠遠落於其他理工大學之後，這種向理工與期刊論文傾斜的政策，持續對於台灣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周祝瑛，2003a)。

參、香蕉與橘子如何比：大學異化現象

自從加菲 (Garfield) 博士提出引用 (citation) 概念，並於1958年在美國費城創立ISI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以來，其所建置出版之SCI、SSCI及A&HCI等跨學科書目資料庫，因具有文獻之被引用資訊及涵蓋最大範圍之學科領域，形成相當之影響力。平均而言，自然科學有近50%的期刊被ISI引文資料庫收錄，但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被收錄之比率卻不及20%。許多研究指出，不論是在研究的型態上或是研究結果受檢驗的時間長短，理工與人文的研究均無法以同一標準評比之，也不可能像理工學科強調所有研究皆具有可重覆驗證性特質 (黃慕萱、張郁蔚，2006)。

另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受到所處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影響，難以跨越文化的界線，且其中經常需要花許多時間克服語言文字的障礙。相對之下，理工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則較無上述問題。因此以量化為主的評鑑指標，是否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成果不無疑問。

在大學評鑑與政府獎補助政策強調上述指標下，出現了有違原先提升台灣學術水準的異化現象。此外，由於ISI引文資料庫係目前唯一能提供大量且便捷書目計量數據之跨國檢索工具，在沒有其他更好工具可以提供之情形下，使得SCI、SSCI及A&HCI仍得以一直維持屹立不搖之地位，不但各國期刊主編以期刊能被收錄感到光榮，包括我國在內之許多國家的大學，對教師之評鑑相當看重發表在ISI引文資料庫收錄之期刊上之文章數量，甚至有些大學以獎金鼓勵教師努力投稿至被ISI引文資料庫收錄之國際期刊上，以致於誤導部分人將SCI、SSCI及A&HCI奉為學術評鑑之最重要標準。

此種以SSCI等單一標準下，台灣的學術研究成果越來越少能成為業界或政府部門所運用。尤其更嚴重的是抑制原本學術多姿多彩的發展，嚴重打擊人文社會學科的士氣，影響大學的教學品質與教授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換言之，如果我們經常鼓勵學生重視多元文化，強調發展學生的多元智慧，那麼憑什麼可以用一套標準來評量教授的好壞？教授是一個良心志業，當然同時也需要評鑑。但是如果落實多元標準並行的評鑑制度，繼續重數量輕品質、重理工輕人文、重研究輕教學，會不會淪為西方學界眼中的怪現象 (SCI: Stupid Chinese Index) 呢？

肆、高教評鑑中教授地位的式微

反觀這些知識社群的學術成果產出者、盱衡世界的各國大學教授，除了站在學術的頂端外，無論中外這些人都有許多相似的經驗與挑戰。例如：每一位教授都要從事教學工作；多數人為了撰寫研究計畫與專著而向政府與民間爭取研究經費，同時評論別人發表的作品；另外，也與同儕維持友好或者是同一社群的網絡關係 (network)；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被學生與社會大眾視為提升下一代能力與潛

力的關鍵人物。這些可說是構成大學中學術責任（academic duty）的重要內容（楊振富譯，2000）

從這裡可以看出，各國大學教授的角色大約可以分成以下幾項：1、教學：大學部或研究生，甚至對在職進修人員。2、學術研究：針對學術專業主題提出研究，藉此提升個人專業地位與學術水準。3、社會服務：根據本身的專業訓練，針對社會上的議題，提出個人的看法與接受諮詢，負有影響公共政策與喚起民智的責任。（金耀基，2003）既然大學教師負有多重的角色任務，那麼以特定的研究成果（如 SSCI、SCI 等發表數）來評定大學教師，甚至大學的整體表現，這樣的思維與做法就難怪備受各界質疑了！

近年來由於大學經費的緊縮及分工日益精細，使得許多先進國家的大學教授為了養家糊口、增加收入以提升生活品質而奔波，平時忙於教學與研究計畫，並且多數人與社會上的公共議題保持距離，以示中立客觀。換言之，上述所強調的社會責任感，往往會因個人研究計畫的忙碌而不再積極去扮演。曾經擔任過史丹佛大學校長的甘迺迪（Kennedy，1997）指出，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美國大學教授在全國的公共知識庫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各行各業的崛起，例如：隨著新聞媒體和各種基金會的加入，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些人扮演著比過去更具有反省與批判能力的角色。相對之下大學教授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以致經常遭到外界批評：大學教授大多只能專注學理、埋首於旁人無法理解的學術研究；人文學者只重作品的考據與寫作技巧，忽略時代的意義；社會科學者往往只在追求數據與量化，漠視社會科學應與社會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而分子化學家則只能投入生物遺傳研究，一心一意開拓新的領域，但對解決威脅民眾生存的常見疾病卻著力不多。因此，社會大眾原先期待大學教授能夠在社會上本著良知、提出諍言、扮演諤諤之士的領導角色，往往只能希望落空。而這個現象與大學校長領導能力的式微也不無關係。以美國為例，有魄力且關心社會的大學校長已不多見；在過去，美國幾位享有盛名的大學校長，之所以受到社會尊重的原因不在於他們在校內施展卓越，而在於能夠對社會公眾事務勇

於挺身而出，甚至對政府施政興革提出諍言，不但言行贏得社會大眾的尊重，也間接提高大學的社會聲望。由此可見，一所大學的好壞，不只在於教授們學術研究出版數量的多寡、研究成果的績效，更重要的是大學教授如何擔負振聵啟聵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只求個人研究經費學術的溫飽而已。誠如史記商君列傳所言：「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大學教授不應以個人成就為足，遇到公共事務能挺身而出才是全民之福。

伍、大學教授與公共知識份子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73）曾提出知識份子可分為傳統型（致力維持現狀）、與有機型（主動參與改變社會）兩類。而長久以來關心知識份子議題的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則進一步提出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概念。薩氏認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特質除了以寬容、開放的說理與溝通來討論議題，避免訴諸人格身分、學術專業、傳統信念的權威之外，同時能夠在公共說理時，面對所有的權威提出質疑與反思。公共知識份子在面對現實的規範與價值中，能夠以開放與平等的方式進行說理，屏除個人的主觀信仰與認知。這樣的知識份子能夠接受差異，敢於向社會上壓制的勢力進行挑戰與辯論，被視為社會良知的重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與過去所謂的「御用學者」有所區別；所謂的「御用學者」常常為執政當局的言論政策提出背書，而公共知識份子則往往扮演與當局權威相抗衡的反對角色。然而，遺憾的是在華人的世界中，一般人對社會多樣化及容忍異己的程度較為有限，且常常運用道德的言語或學術權威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無法真正就事論事、持平以待。因此，任何公共知識份子在進入公共領域時，最重要的是能否秉持公民本分，發揮說理的專業與文化素養，這一點可說是現今社會，尤其是台灣中非常缺乏的一項特質（錢永祥，2000年）。

至於談到當代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應當首推美籍巴人薩伊德。薩伊德教授於今年十月辭世後，許多人將他歸諸於全球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 的典範。這位身為少數在英美國家擁有發表權的巴裔精英曾提到：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是他人生的轉捩點，這個戰爭讓他將過去學術與政治截然劃分的想法為之完全改觀，自此兩者無法分割。而其在一九七八年發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九七九年「巴勒斯坦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等書後，這位曾經在美國數所長春藤名校任職的美籍巴勒斯坦後裔，一直成為全球最具有爭議與傳奇性的學者。一方面，他在美國擔任大學教授，但也在美國長期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國，甚至為其擔任流亡國的議員，成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中最重要的代言人。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描述西方人眼中對阿拉伯世界的扭曲。雖然該書並不包括華人世界的東方主義，但其留下的公共知識份子典型，卻分外值得當前台灣學界作為參考。理由是首先他強調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薩伊德一生中扮演巴勒斯坦人、美國人與大學教授三重身分；他曾說：自己最重要的生命挑戰即是從事批評與維持批評的立場，從不畏艱難險阻。其次，從文化角度追求社會正義：薩伊德認為，西方國家的東方其實是一種基於偏見、貶抑、誤解與宰制的虛構產物，這種文化權力的建構其實是植基於西方國家帝國主義的政治權力。對當前的台灣社會而言，如何讓各族群在各領域(包括公共領域)中，建構公平與正義的平台，具有相當的啟發性。第三，以人文主義促進西方社會對東方的了解：薩伊德主張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問題解決應基於歷史性的了解(historical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之後，能夠追求和平共存、尊重身分認同、減少排除異己，並為此建構更寬容、更寬闊的人文主義。對台灣來說，社會各階層如何用歷史同情的了解來消除族群之間的怨恨情節，不無啟示(何榮幸，2003)。

此外，薩伊德認為知識份子(尤其大學教授)，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是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侷限於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專業人士。他認為公共知識份子應具有批判角色與為弱勢伸張正義的立場，但如同薩伊德在「知識分子再現(表述)」(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一文中提到，大多學界同仁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保守且有些排外。其中有不少人

為了切身利益的維護，而對學術行規甚至執政當局唯唯諾諾，未能善盡為促進社會的改變而扮演的批判角色（單德興，1997）。另外，有些知識份子囿於專業化與職業化，把自己定位為朝九晚五（或7—11）、不逾越公認的典範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往往對事沉默而沒有太多的聲音。因為大多數的改革一旦成為專業化就窄化了公共空間，排除一般人的討論機會，使得許多攸關民眾權益的事務由專家（例如：教改專家）所壟斷，甚至在涉及大眾切身利益時往往被犧牲。有鑑於此，薩伊德特別強調，大學教授應該以批評的超然意識去從事世俗的批評，冒險公開參與辯論，因為知識份子的價值就是被大眾期望能夠宣揚代表特定社會良知的看法、觀念與意識形態，並且希望他們能在社會上產生一些作用。

薩伊德曾形容，在他流亡的過程中，在廣泛無限流通的演講、撰書中，冒著不確定的風險與結果，而不受限於由專家和職業人士所控制的內行人的學術空間（academic inner circle）。這樣的行動不受拘束反而更能支持其個人所選擇的觀念與理想，因為它們更符合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與原則（轉引自單德興，2003）。在公共知識份子的實現中，薩伊德選擇的是更廣泛的事務，因為能夠超越學術行業的規範，反而受到各行各業的獻身激勵，跨越自己原本狹隘的職業（學術）生涯。而在這過程中，更能有意無意為對公共事務的觀點，爭取更新、更多的聽眾，而這些觀點也是以往在大學的課堂中不曾呈現的內容。

陸、高教評鑑下的大學教授角色省思

正當台灣的大學教授與多數歐美先進國家的同行一樣，忙著為爭取研究專案、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為提升個人生活品質而努力時，卻也可以看出這些年來，學術社群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懷正逐漸冷卻。原本有許多人期待的改變——政治解嚴之後期有待型塑的公共論壇，並沒有在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之後的二十多年中逐漸形成，反而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人物、新聞媒體和電視成為台灣家長與教師心目中的三大公害（何琦瑜，2003）。台灣民主發展可說在媒體自

由化後，並未走向全面的民主化，甚至期望解嚴之後能提升整個社會的理性發展，並形成公共論壇的空間，這樣的夢想並沒有因解嚴而實現，反而是整個社會出現更為煽情、言論更為激化，市場廝殺與控制的痕跡更為明顯的情況。其中最大的犧牲者可說就是「公共政策領域」遭到前所未有的商業化宰制（李金銓，2002）。

誠如杜維明教授曾經提到，欲讓社會改革朝向正面的改變需要公共知識份子的參與，如同薩伊德、葛蘭西等人提到，公共知識份子不僅是有機的知識份子，更具有政治關懷、參與社會，並擁有文化敏感度與人文科學素養，能夠透過反思與理解來關心這個社會（Tu, 1998）。在這些年來，這樣的知識份子一則在學術界，一則在媒體。可是在國內現在的媒體，整個市場化的過度競爭與扭曲下，公共知識份子的力量並沒有適度、適當的發揮批判精神；加上學術界又因學術資源的激烈競爭與權威的宰制下，這些年來公共知識份子參與社會的身影愈漸模糊。

可是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如何看待上述發展？還有怎樣向下一代交代呢？如同美國趨勢大師梭羅（Lester Thurow, 1938-）在他的「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書中提到（Thurow, 1967），未來的人類需要的不是上述的煽情和激化，而是必須具備兩項條件：擅用科技帶來文化助益的能力，和個人的應變能力。由於各國目前都在培養如何帶動新的文化，屏除過去模仿與抄襲，增加下一代人民的適應變化與創造能力。因此，未來社會上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不懂得學習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學教授如何教導國民了解這些新的趨勢，適應這些變化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以日本為例，他們最近討論，目前所從事的各項社會改革以教育改革最為關鍵，因為教育改革是日本是否能成功轉型的一大關鍵。反觀台灣，近年來所推行的的大學評鑑制度能否讓各大學脫胎換骨？抑或讓大學校園充滿功利主義色彩，而讓大學的理想性與教育品質大受影響？這些質疑其實是需要更嚴謹的討論與研究來驗證。然而綜觀這些年來，由於台灣社會上整個公共論壇空間並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因此，社會上公共知識份子的研究成果與社會聯繫（social connection）發生相當大的差距，

甚至對於近年來高等教育實施評鑑的改革政策，迄今仍未看過有較大規模、科學化的檢討與評估。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台灣學術界國際期刊論文每年大幅提升，但其研究成果對解決社會問題，甚至能將研究結果供產業界使用性仍低（黃光國，2010；台灣立報，2009），而這種差距仍舊持續在擴大中，讓人十分憂慮。

另一方面，台灣政論家南方朔先生提到，台灣目前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升級的挑戰（Upgrading），如何升級需要學術界的堅持與啟蒙，展現自身的專業，把問題說清楚，讓台灣高等教育是朝向培養創新與思考人才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投機或操短線。可是值此之際，當台灣教改亟需透過公共論壇討論，以致於各種教改措施需要全面修正時，這些知識份子的力量又未能適時發揮社會批判的功能，無法發揮監督制衡的力量。

柒、女性擔任公共知識份子的困境

傳統以來，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長或是公共知識份子的探討上，通常不涉及性別差異的問題。但事實上，學術界，尤其在華人地區，性別的差異程度更甚於西方國家。從作者數年前曾經針對全國男、女大學教師升等、收入的討論中發現，儘管政府自一九九〇年初已經實施同工同酬制度，但實際上在個人總收入（校內、校外總收入）上，在一九九〇年初男女每年差距約十二萬新台幣；在工作分配中，大部分女性教授負擔比較多的教學任務、擔任較低職位的行政工作。此外，在大學行政部門的三長中，女性始終為少數（Chou，1992）。這十多年以來，儘管這樣的情況隨著女性加入學術界的人數增加而有所改善，但仍維持男性在升等、收入等方面的優勢。

根據西方研究指出，男、女性大學教師仍有以下的差別待遇：性別刻板印象、缺乏男女同值（Comparable Worth），對女性的表現不像給予男性一樣的肯定，機構本身的差別待遇也可看出，在一些重要職位的安排上，也是以男性為主，包括行政主管的遴選。另外，在人際關係上，學術圈有所謂的「人際關係網絡」（the

Oldboy Network), 非正式互動團體。對女性來說, 在工作之餘或學術發表的場合之外, 很少參與宴請, 這是因為大多數女性要負擔家務, 無法在夜晚或假日外出參與社交活動。因此, 有些研究指出, 婚姻, 尤其有兒女之後, 對女性在學術出版、成就表現方面有相當負面的影響。(Chang, 1995)

誠如許多專業團體一樣, 學術社群原本是由一群有特殊興趣、經驗、資源的大學教師組成, 本身具有相當獨特的文化與特性, 例如: 多數大學教師在此行業皆表現出相當獨立的學術自主精神, 或個人成就表現, 來完成個人自我信念的追求。許多人也認為, 學術表現的評鑑應基於個人表現 (merit) 而不應該存在任何差異。不過舉世來看, 大學教授這一行仍由男性主導, 女性的職位通常較低。因此, 在學術界上, 女性是屬於少數的團體, 也處於偏低的級職, 專業的領域也都集中在利益較少的部分, 例如: 教育、護理、文學等。研究顯示 (Chang, 1995; Chou, 1992), 女性在大學教職上並未受到兩性的平等待遇, 大學教師在任用、酬勞、升等、永聘 (tenure) 的過程中, 仍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

不過不論是薩伊德或是其他研究都對性別議題有所忽視, 因為多數學界人士認為原本在學術界, 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早已是跨越性別界線的 (邱彥彬譯, 2003)。薩伊德曾提到, 由於知識份子無法改變其出身及既定的語言、國籍、性別情況, 因此他可以善用語言達到為弱勢族群伸張正義的目的。只是以國內為例, 迄今多數參與國家政策與規劃制定的仍是男性為主。以台灣教改為例, 從行政院教改委員、歷任教育部長、到民間教改人士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情況, 即使女性有參與也多從母性的觀點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 (請參閱周祝瑛, 2003b)。在整個公共議題中, 即使如教改, 女性角色常常被邊緣化, 性別的議題也往往受到忽略。

對於學術界的女性來說, 在參與公共事務時, 性別差異似乎很難避免。從國內近年來參與教改公共論述, 包括扮演反對權威與挑戰高教評鑑一元化、市場化趨勢中公共論壇的團體與個人, 女性教授參與的比例皆甚低。若有, 也往往因形象比較突出, 而備受社會與家庭壓力, 甚至出現影響其日後申請研究計劃或升等

不利等後遺症。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大學教師在實踐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時，面對的環境格外嚴峻。

捌、結語：高教評鑑中女性公共知識份子的挑戰

誠如薩伊德所言，真正能夠履行公共知識份子角色的大學教授並不多見，因為要面臨社會主流價值、族群、性別等各方面的壓力，甚至會遭受學術專業群體的反彈。從過去許多例子來看：在台灣從事公共事務時，可能會對大學教授本身的專業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因為除了教學之外，在現有的評鑑指標論文化與數量化的趨勢下，女性在研究與出版機會強烈競爭下，缺乏擔任各種期刊主編、大學校務主管、各學門召集人的機會，再加上在參與社會服務時家庭與工作間的矛盾衝突，女性因參與公共事務而須要發聲時，在同儕間益顯突出，甚至可能遭到學術同行的異樣眼光、嫉妒，進而出現打壓的情況。換言之，女性大學教授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容易面臨到比一般男性教授更多的挑戰。經常面臨到個人、生活、家庭與事業的重擔及角色衝突，甚至在社會參與中，得不到同行的支持。這樣的情形，使得女性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加裹足不前。

儘管如此，如同薩伊德一生所標榜與奉行的一般，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長上，仍需要透過擔任公共知識份子角色來拓展個人關懷的視野，增加對世俗社會的回應；而另一方面，也同時必須面對社會主流價值（如需符合大學學術評鑑量化指標）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在當前台灣高教評鑑充滿期刊論文發表的要求下，如何走出研究象牙塔，參與社會議題討論，甚至起而行動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必須有格外堅定的信念及堅強的意志，否則會受限於行業內研究空間的擠壓及經費來源的限制，影響個人日後在機構內績效評估與專業成長的機會。這也正是現今台灣公共知識份子，尤其女性大學教師所必須面對的嚴苛考驗。

參考書目

中文

台灣論文拚產量 被引用數奇低 (2009 11 5) 台灣立報。

何琦瑜 (2003)。品格大不如前。天下雜誌 (教育專刊)，第 287 期。

何榮幸 (2003)。薩伊德留下的難題。中國時報，10 月 7 日。

黃光國 (2010)。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之提升。引自 2010/09/30

<http://jouchen.pixnet.net/blog/post/26061121>

黃慕萱、張郁蔚 (2006)。人文社會領域學者學術評鑑指標之探討。圖書資訊學刊，4 卷 1/2 期。

李金銓 (2002) 台灣媒介需要在解嚴。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30 日，A4。

邱彥彬譯 (2003) 認識薩依德 —— 一個批判的導論。台北：麥田

金耀基 (2003)。《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

吳清山 (1998)。解嚴以後教育改革運動之探究。教育資料集刊，23。

周祝瑛 (2009)。比較教育與國際教改。台北：三民。

周祝瑛 (2003a)。粗糙評比無助教學品質。中國時報，2003 年 10 月 21 日，15 版。

周祝瑛 (2003b)。《誰捉弄了台灣教改？》。台北：心理。

單德興 (2003)。代表：再現知識份子，薩伊德個案分析。當代，2003，194 期。

單德興譯 (1997)。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

畢恆達 (2009 3 24)。一味追求 SCI 的怪現象，聯合報。

楊振富譯 (2000)。《學術這一行》。台北：天下文化。

錢永祥 (2000)。略談“公共型”的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0 月。

英文

Altbach, P. (2007). Peripheries and Centr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vol. 19 (2).

- AsiaWeek Limited. (2000, June 30). List of Top 100 Asian Universities. Aisa Week, 26, 44-47.
- Bourke, P. & Bulter, L. (1996). Publication types, cit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Scientometrics*, vol.37 (3): 473-494,.
- Chen, K. S., & Qian, Y. X. (2004). *Academic production under the Neo-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flecting o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Evaluation Conference.
- Chou, Chuing P. (1992)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academic reward system: A nationwide study of faculty members in Taiwan.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Chang, F.C.I. (張家宜) (1995) How and to what extent are women and men treated differently in faculty hiring in Taiwan?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 Kennedy. D (1997) *Academic Duty*.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N.C. & Cheng, Y. (2010).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Their Impact*. In P. Altbach (ed.), *Leadership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Routledge.
- Said, Edward. W (1979)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N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 Tu, Weiming (1998). *Self-Cultiv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raig, Edwa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Thurow, Lester (1967)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Macmillan.